

目 录

• 起义史料 •

- 我与黄唐起义……………喻迈常 (1)
- 我起义的前后……………刘汉臣 (10)
- 弃暗投明 势所必然——回忆国民
党转业军官在宁乡起义的始末……………刘麟素 (14)
- 回忆第三支队三团在宁乡的整编……………肖瑞庭 (21)
- 从黑暗走上光明
——《人报》的始末……………黄砺丹 (25)
- 我在宁乡率部起义前后……………毛羽芳 (33)

• 人物传记 •

- 齐学启将军传略……………周德民 (43)
- 胡曜史料……………黄祖同 (50)
- 黄冠群黄卫中烈士合传……………刘麟素 张旭临 (55)
- 何际元和别动军第四纵队……………张季任 (62)

• 名人轶事 •

- 谢觉哉关心家乡林业的故事……………吴岂凡 (76)
- 王凌波宁乡避难记……………张季任 (79)
- 忆甘泗淇将军回宁乡……………杨宣猷 (83)
- 周铁贞二三事……………周德民 (85)

• 其 他 •

宁乡麻山路皮开台概况……………何逸仙 (89)

赐闲园里的一场政治斗争——

旅省宁乡同乡声讨杨致泽……………张季任 (92)

• 编者 作者 读者 •

关于黄钺几个历史事实的说明……………黄钺传作者 (94)

编后语……………编 者 (99)

我与黄唐起义

喻 迈 常

一九四九年春，宁乡黄唐起义，是在反动派多年黑暗统治下，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爆发出一场农民革命运动，是宁乡四髯（何叔衡、谢觉哉、王凌波、姜梦周）及刘少奇、甘泗淇等许多革命老前辈，长期培育出来的革命火种的引爆，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地下党（省工委）的正确领导，艰苦奋斗，深入敌后，所取得的革命硕果。

我之毅然参与策划、组织黄唐起义，也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一则乃我青少年时代受了革命老前辈的革命熏陶；二则乃我多年宦海、戎马生涯，耳闻目睹旧社会之种种黑暗，所激发的正义感与爱国心所致。

我在伪甘肃省政府任中校警卫大队长时，于一九四三年冬被省主席谷正伦以“共党嫌疑”、“企图谋杀省主席”而下狱一年多。经亲友多方营救，谷正伦在始终找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只好“交保释放”，我才侥幸“虎口逃生”。

我获释回湘后，决心与国民党一刀两断，矢志追随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一九四七年我回到长沙，与当时湖南大学教授姜运开取得联系。因他曾经参加过革命，思想进步，我想通过他一定可以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然后在长沙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一个反蒋组织。但当时长沙情况复杂，反动派垂死挣扎十分疯狂，特务横行，戒备森严，成立

反蒋组织，遂成泡影。

这时，我只好回到自己的故乡——宁乡黄材。黄材地区靠近雪峰山区，崇山峻岭，于我地形熟悉，人缘也多。同时上宁乡曾是“四髯”开展革命斗争的摇篮和发祥地，播下了无数革命种子，其中我最熟悉的有饶孟虎和姜亚勋。他俩和我从小同学，饶是王凌波的内弟，屡遭国民党追捕迫害；姜亚勋一贯富有革命思想，他早有效法闯王起义的大志，我想与饶、姜二人密商在本地开展革命反蒋斗争是非常有利的。于是我在一九四八年端阳过后的一个星期天，偕内弟到了姜家里，久别重逢，倍感亲切。姜当时是姜氏流光小学的校长，他留我们午餐，彼此推心置腹，慷慨畅谈达五、六个小时，当我坦率地谈出想找共产党干革命的想法时，他频频颌首，并拍着胸脯，慷慨激昂地说：“只有这条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国民党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必然要垮台。共产党的政策好，很得民心，群众非常拥护，共产党一定能成功……”。随着拿出《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给我看，他说这本书所写的就是我们目前要实现的目标。最后我说：“我们一定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事情才能干好，我们才有正确的方向，不然，将来人家说我们是土匪，我们自己身败名裂不要紧，给革命带来损失就糟了，你一定要设法先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说：“暂不要急，我们总可以找到党的。”一席密商，真可谓志同道合，一拍即成。这次见面，对我鼓舞很大，并坚定了我的革命信心。

十多天后，我又到流光去找姜亚勋，这次饶孟虎同志也来了，我与他俩相逢，异常亲热。我们通过抵掌倾谈，细细密商，对革命行动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更加深了认识，坚定

了信心。以后我们还经过多次密商，其中一次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四八年阴历九、十月的一个深夜，姜亚勋和饶孟虎来到我家里会商，主要是研究如何采取行动，开展工作。最后三人一致认为：首先要发动、组织一支农民革命队伍，才有群众力量作基础，我们商定各人负责发动、组织五十到一百个可靠的农民，能随喊随到，听命行事。第二天黎明，姜、饶二人悄悄地离开我家，以避免别人的注意。

过了几天，亚勋同志又邀我到陈仲怡家去集会密商，陈是何叔衡的外甥，曾因追随舅父参加革命，屡遭敌人陷害，但当时是黄绢乡乡长，在他家相聚密商，可以蒙蔽敌人。我原来不认识陈，经亚勋同志介绍，彼此一见如故。斯时，饶孟虎同志亦已赶到。我们具体研究了如何筹备武器和组织武装力量等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一是实行“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的战术，打入国民党部队进行策反；另外是收集民间私藏的武器。姜分析了宁乡自卫总队和乡公所的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望北乡乡长张昼荣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于是我们约定会后第三天，同去拜访张昼荣。张不仅是望北乡乡长，而且还兼任宁乡自卫总队的一个中队长，他与总队长宋品三交情甚笃，是宋最亲信的人。张手下掌握百多人枪，若能如愿争取过来，大有助于革命事业。我们到乡公所后，张昼荣接待殷勤，经过我们多方启发，委婉陈辞，他终于被我们说服，当即表示愿意支持。临别时，姜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张昼荣说：“假如我们上了山，你就莫来打我们呀！并请致意品三公。”张回答说：“请放心”。

随后，我即和姜亚勋同志同去长沙拜访李伏波，因李的哥哥李惕乾是长沙县的县长，李伏波是秘书，姜想活动李伏波在长沙县给自己搞一个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职务，以便掌握

人枪，适时拖枪上山打游击（县长名义上兼总队长，实权由副总队长掌握）。后来虽搞到了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职务，不料风声走漏，不独姜亚勋的副总队长当不成，而且早已安排在警察所准备拖枪上山的姜应钟也站不住脚了，只好悄悄地离开。李惕乾因此受到地主豪绅的攻击，被迫辞去县长职务。以后李伏波策动交警大队长刘汉臣带领全部美式装备的人枪起义加入我军，并任命李担任一支队参谋主任，李对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长沙归后，姜、陈、饶和我商定，由我去益阳专员公署活动一个自卫中队长的职务，掌握一批人枪随时反正，但没有成功。这时大家又决定要我去南京，想办法找旧同事搞点武器弹药，并进行策反活动，结果只搞到一条二十响的马牌手枪。回到宁乡黄材后，得知姜亚勋同志等已与李石锹同志取得联系，共同策划起义事宜。李石锹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马日事变后，曾参加过沔山起义，在江西红十军和八路军平江办事处参加过斗争，抗日胜利后，到过南京梅园新村，与童小鹏等同志会晤，接受了回乡开展工作的指示，在滩山铺组织了“湘中人民解放委员会书记室”，简称“解书室”。我们和李石锹同志联系好了，也就是找到了党，更坚定了我们起义的胜利信心。

这时已是一九四八年年底了，我们在社会上的风声越来越大，敌人也在密切监视我们的动静。我们如果不当机立断，先发制人，迟迟不发动武装起义，肯定有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我们果断决定除夕发动农民暴动。但探知敌人已有戒备。为避免作无谓牺牲，我们把首义日期推迟到一九四九年农历正月十三日深夜。我们的行动计划是兵分两路，同时来一个猛虎洗脸，使敌人迅雷不及掩耳。一路由我

和姜亚勋同志各率领数十名可靠的农民，负责袭击黄材警察所，我们的武器除四支手枪外，主要是木棍、梭标，锄头等；另一路由陈仲怡、饶孟虎两同志率领黄绢乡的二十余人枪，负责袭击黄材大湾乡乡公所。是日深夜，我们如约举事旗开得胜，一举缴获了黄材警察所和大湾乡乡公所的全部武器，计长短枪八十一支，手榴弹六十五颗，子弹五千余发。

同夜，李石楸和刘美孚同志等，率领农民数十人，携带手枪五支和部分木柄手榴弹在唐市举行武装起义，缴获了唐市警察所全部武器，计长短枪四十二支，子弹四箱，电话机一部。“黄唐起义”之名，由是而来。

当时我担任袭击黄材警察所的先锋，我佯称是益阳专员公署派来的委员，有要事会见所长，于是趾高气扬地冲着门卫，只身直奔所长室。此时我明知是身入虎穴，但我想既然要革命，就不能怕牺牲，想起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置生死于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我更勇气百倍，信心十足了，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一个虎步就跨进所长室。所长何琪见来势不对，他一手捂被，一手往枕头下面摸手枪，我不得不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拔出马牌手枪对准何琪的脑袋猛响一枪，把他击毙。这时后续部队闻声一拥而入，姜亚勋同志高喊“缴枪不杀！投降有赏！”所里警察人员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个束手就擒。

首义奏凯，我们即将全体起义人员编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第三纵队”，并以湘中人民行动委员会名义，印发《告湘中人民书》及《致程潜的公开信》，宣布我们起义的革命意义和目的，公推陈仲怡为司令员，姜亚勋为副司令员，喻迈常为参谋长，饶孟虎负责政治。在湘中地区正式升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面武装红旗。由于中国共产党

光荣、伟大、正确的光辉形象，久为湖南人民特别是劳苦大众所敬慕和爱戴，因此，贫苦农民、小学教师、知识青年和一些穷愁潦倒的旧军政人员都陆续自动投奔而来，我们的队伍，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不断壮大，武器不断充实，最后成为一支由党领导的拥有五个团、两个直属大队、势力遍及湘中的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当时给地方反动政权，尤其是给反共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对和平解放湖南，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的。

黄唐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吓坏了反动派，正如鲁迅诗句所描述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敌人慌忙纠集湘中各县自卫总队和省保安团队的兵力数千人，从四面八方向我军重重紧密包围，发起猛烈进攻，妄图将新生革命力量扼杀在摇篮之中。这时我军刚刚建立，人枪不过两百左右，面临着被敌人一网打尽的危险，只好将枪支弹药暂时藏匿起来，化整为零，各个突围，以保存实力，徐图发展。姜亚勋同志在这危急关头，充分发挥了勇敢机智、坚强不屈的革命领导者的才能，他采取缓兵之计，一面佯装与敌人谈判，一面暗地重整兵力，以图挽回危局，东山再起。我在突围之后，随即和谭荫南同志，潜入长沙匿居在张薰陶家里，进行统战策反工作，以争取外界力量的援助。当时我们考志张的妹妹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共产党员，他的妹夫童小鹏在中央有较高的威望和地位，他自己也有进步思想和爱国热情，他不会暴露我们的身份和泄漏我们的机密。首先我们策动长沙伪军宪兵第十团的一个连倒戈，但因客观情况的阻力，这个连当时不敢动，连长李度衡答应“以后相机行动，可能异道同归”。此外，我和谭又回到宁乡找到了过去当过田粮处长的邓禄荣（他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革命），共同策动县警察局长袁茂庭

投诚起义。后来，又经过闵令之、邓禄荣、刘麟素等同志策划，袁茂庭终于起义了。袁部编入我军第二团，袁本人任该团副团长。同时我又借宗族关系写信给县《人报》主要负责人喻孝怡及宁乡民社党负责人喻培之及民主爱国人士张柏森等多人，请他们认清时局赞助我军，以扩大舆论宣传影响。我这封信以后在宁乡《人报》发表了。

后来，《人报》在报道我们的消息时，不称“土匪”而称“土共”，反动当局一再对宁乡《人报》提出警告，该报被迫停刊，总编辑、副社长、编辑等相继参加了我军。

我和谭荫南同志奔走于长沙宁乡之间，进行了二十多天的策反工作，随后返回部队，继续武装斗争，进展顺利。如四月底一举歼灭了敌保安八团留驻在横市的一个加强营，俘获敌营长汪洋以下四百余人，缴获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十八挺，长短枪三百余支、子弹六万余发，手榴弹十八箱。各地战斗，也甚得手。

由于我军日益壮大，声势传播省内外，得到中共湖南地工委的重视。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湖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周里同志，亲自主持秘密武装工作会议，决定以姜亚勋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部队为主，将湘中各县及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统一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而姜所领导的武装编为“湘中第一支队”，下辖五个团、两个直属大队，任命姜亚勋为司令员，陈仲怡为副司令员（陈因年老体衰，至三月中旬，主动让位），官健平为政委，徐上达为副政委，庞柱中为政治部主任，李品珍为副主任，饶孟虎为武工总队长，喻迈常为参谋长，刘正为政治部主任秘书，以组成支队司令部。当时党交给我军的任务是：“积极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迎接我大军渡江南下。”

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日日夜夜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作战威力日益提高。六月下旬，各团协同作战，在安化温塘地方一举歼灭了伪西南民主联军总司令尹立言部四千余人，缴获大批枪、炮、弹药及马匹。因此，敌人把我军视为共产党插入其心脏的一把尖刀，认为不把我军消灭，就不能保障他们大后方的安全和阻止南下共军的步步进逼。所以敌人先后不惜调动全省自卫保安团队数千人和六个正规师的兵力，从湘、宁、安、益等县四面八方向我军进行疯狂“围剿”，重重封锁，使我军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等严重缺乏，斗争至为艰苦，历代兵家都把军糈视为军队的生命线，素有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和“兵无粮则亡”之说。幸我军供给部部长张季任同志，对军需后勤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他率领所属全体供给人员，日夜奋战，筹集、抢运军粮，为我军后勤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我决心把生命献给党，在枪林弹雨之中，我总是奋不顾身，身先士卒。每晚大家都已宿营就寝，我还得搜集敌情，布置警戒，并向司令部汇报，研究好第二天的作战、行军、宿营等计划，一天顶多只有五个小时的休息和睡眠。虽然生活如此艰苦，战斗如此激烈，但我的心情始终特别愉快。党组织对我通过严格的考验之后，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接受了我的入党要求，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心情之愉快与激动，真是难以言状啊！从此益加坚定了我对党奋斗终生的信念与决心。

然而，世事沧桑，人生道路坎坷曲折。正当自己满怀热忱为革命事业竭尽棉薄之时，不料至一九五二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二步校的三反五反运动中，竟遭苦斗严逼诬陷。

蒙冤达三十年之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我的历史冤案得到平反纠正，过去强加于我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党籍亦已恢复，使我古稀之年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我感激的心情，是无法可以言语形容的。

当我恢复党籍的消息发表后，一些地下党的老同志和湘中一支队的老战友向我写信祝贺，给以策励和安慰，有位同志还给我寄来了这样热情洋溢的诗句：“喜讯传来意料中，丹枫霜菊识忠诚。当年跃马汾江岸，今日扬鞭夕照红。”我也随兴奉和这样几句：“昔年携手战湘中，为解民忧贡赤诚，风雨狂涛惊梦岸，党恩辉照夕阳红。”用以感激党对我晚年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也不负战友和同志们的殷切期望。

（本文作者系原湘中一支队参谋长。现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

我 起 义 的 前 后

刘 汉 臣

我名刘汉臣，现年八十二岁。一九四九年春，我任国民党交警第十一总队的大队长时，在宁乡率部起义，参加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一支队，起初编为突击大队，后编为第一团第二大队，转战各地，直至解放，为配合湖南和平解放，贡献了一点力量。现将经过情况，简单回忆于后：

原先，我在国民党部队当过连长，抗日战争期间在前线失败后，回到宁乡打过一段时间的游击，抗战胜利后，我闲居在宁乡县城。一九四八年冬，国民党交警十一总队总队长王力忠派人送来一张派令，委派我当少校大队长，要在宁乡新成立一个大队，武器弹药要我找何际元洽领。何际元原是伪别动军第四纵队指挥，那时王力忠是他手下的第二支队长。抗日期间，他们都在宁乡活动，即所谓“正义军”，所以和他们有些交往。抗战胜利后，何还储存很多美式武器，放在长沙西长街建华米厂，米厂经理文武原是何的军需，发了点横财，开了这个米厂。何际元带我到文武那里，领了十二挺轻机枪、五支汤姆森冲锋枪、一百多支卡宾枪和三八式步枪、十多支美式左轮手枪，一百八十个手榴弹，一百多把刺刀、九十把马刀、二十箱子弹。文武说：你要多少，就发多少。我因部队还未成立，不敢多领。回县后，我驻南门忠

义祠（邓姓宗祠），招兵买马，很快就组成了这支部队，加紧进行整训，可算是一支人强马壮、武器精良的队伍了。

我对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和倒行逆施的种种罪恶行径，早有不滿。这时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已成定局。为了祖国的解放和个人的前途，我决心弃暗投明，反戈一击，但一时找不到关系，终日闷闷不乐。于是，常到谢建中家打麻将牌，以解忧愁。谢曾是何际元的参谋，我与他早有交谊。在牌桌上还结识了陶立人。陶是一位赋闲军官，是陶峙岳将军的亲侄子，为人直爽，重义气。他的妹夫李伏波，思想进步，社交广阔，活动能力强，是姜亚勋的老同学、老同事。姜起义前，多次与李共同策划。李家住长沙，是姜在省方进行策反的权威人士。这些内幕关系，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在谢建中家混久了，与陶立人的关系也就日益亲密；在牌余酒后，对陶透露了自己想要起义找不到门路的内心苦闷，陶听后很快找来了李伏波，并约相会在东门外梅家田河边。我和李、陶在河边见面后，我坚决表示愿冒最大风险率部起义，投入姜亚勋部干革命。他们同表欢迎，并问我有无困难，我向他们反映了一点具体情况：交警十一总队驻在上海一带，与我大队失去联系已久，士兵已几个月未发饷，如果能酌量发点钱买点日用品，则起义时士气要高昂些，行动更能一致。他二人答应设法筹款。不到两天（三月三十一日），李、陶二人送来银洋四百二十元，我当时就发了饷。事后得知，李伏波回家后，父母兄弟都支持他的行动，母亲交给他一对金手钏，换银洋一百二十元；陶立人回家，在当地借得银洋三百元。他二人为了解放事业，公而忘私，慷慨解囊的正义行动，令人敬佩。当晚研究决定，第二天清早就

把部队带出南门，宣布起义。

当时，宁乡县城还驻有国民党部队三一四师^{*}，我们的行动，必需提高警惕。我要士兵上街买日用品时，故意散布流言，说是我部缺粮，行将断炊，准备到“匪区”去抢粮，以麻痹敌人。四月一日拂晓，我把队伍带出城时，还有一部分青壮年随部行动，要求入伍，我都收下。李伏波、陶立人早在城外等候，会合后一道迅速前进。路经仙凤乡公所，我们一举攻入该所，俘虏伪乡长谭湘鉴和乡自卫队长王寿生，缴获步枪三十支，自卫队士兵要求投诚起义，我也收了来，队伍得到迅速壮大。

四月二日，我们到了回龙山下，其时姜亚勋部正驻在回龙山上白云寺，李伏波上山汇报情况，姜派副司令陈仲怡下山，与我们洽谈收编事宜。当时姜、陈的意见，要将我部建制编散，我没有同意，我只能和弟兄们一起行动，一起战斗。谈判暂时没有取得结果，这是因为双方还未建立信任，我以为编散了，就是吃掉了我的部队，弄得自己无职无权。姜、陈这时实力还不强大，我部不编散，如果出了乱子，他们难于控制。经李、陶和我商议，我部暂称“湘中人民护乡军”，公推李伏波为司令，陶立人为参谋长，我任大队长直接掌握队伍，协同姜部打击敌人。我们活动于钱塘、大湖一带。四月下旬敌三一四师派唐典团，到灰汤大坟山粮站来抢粮，我部配合姜亚勋部打退唐典团，保住了赋谷，并缴获了步枪十六支、战马一匹，但牺牲战士郭云初一名。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姜亚勋认为我起义是忠诚的，部队也是有作战能力的，正式编我部为突击大队，人员也未编散。我任大队长，陶立人任副大队长，李伏波调司令部工作。

后来，省工委决定把姜部编为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

一支队，我部被编为一支队第一团第二大队，仍由我任大队长（该团一大队长是王志高，三大队长是张贻孝）。我部编入姜部后，建立了政治制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先后参加了围剿湘乡的蒋麒麟匪部、攻打湘潭姜畲的保安部队、围歼窜扰安化温塘的尹立言（号称西南民主联军总司令）伪军等大小战役多次，屡建战功。七月初，反动当局动员八十七、八十八、二三二、六十三、十九等师和一百军以及保安团队，从湘潭、湘乡、益阳、安化四面八方对湘中一支队进行大“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这个“心腹之患”。湘中一支队采取以大队为单位，分散作战的战略方针，机动灵活，与敌周旋，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艰苦的大小几十次战斗，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解放后，我们的部队在益阳集中整训，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思想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到十月十六日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我奉调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学习。现在我被安排在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任职，党和政府从政治上生活上对我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过着幸福的晚年。我决心在有生之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祖国四化建设贡献余热。

注* 三一四师后来酝酿起义，于六月底被白崇禧派重兵围攻于岳麓山，该师解体，唐典率王亚炯营突围，投入湘中一支队，授以第六团番号，随司令部行动。

弃暗投明 势所必然

——回忆国民党转业军官在宁乡参加起义的始末

刘 麟 素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凭借美军飞机、大炮，妄图消灭共产党，独霸天下，把部队大量调遣北进，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其嫡系部队加强装备，干部要用青一色的“军校正牌货”来加强实力；而对那些行伍出身的杂牌军官以整编名义排除军外，但又不想一脚踢开，采取收买拉拢的办法，在全国各地成立军官总队。湖南的南岳就有个二十七军官总队，总队长蒋伏生（祁阳人），亦非其嫡系。

这时，我正从贵阳回到长沙，欲谋职业，因人浮如事，乃致失业，后经朋友介绍到南岳军官总队工作。军官总队的军官又经过一番筛选，有的资遣回家，有的编到部队参加内战。像我这样的下级军官人员无错再编入作战部队，故随那些杂牌货送进武汉中兵训练团，学习三个月转到地方工作。蒋介石殚空心思地为这些人画了一张“护身符”——《特种考试及格证书》，使这些人在地方永远乖乖地为他卖命。

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这个期间从全国各地退役、转业的宁乡籍军官相继回到宁乡，我是其中之一。这些人自认不凡，来到地方必然要争权夺位，地方官吏无可奈

何，只好一一安置，拿枪杆出身的仍干本行。黄材、道林、双江口等地的警察所长都是转业军官，县府军事科长也是转业军官，我当上了科员，其他文教、建设等部门统统都安置有转业军官。宁乡还成立在乡军官会，会长唐植成，是个上校军官。转业、退役军官在地方就形成了一股势力。

家父对我混入了衙门甚为忧虑，甚至为我前途而惋惜。我对于父亲的教诲，既无反感，但也未能毅然摆脱当时的处境。随着社会的发展，蒋家王朝濒临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南挺进，孟良崮、济南、辽沈、平津、淮海等战役的捷报相继传来。其时，我才体会到父亲平时对革命前途的乐观将要成为现实，而我却仍置身于污泥之中，又将如何拔足呢？！一九四八年的初冬，我因婚事请家父来县主持，这次父子间在思想上又进一步接近。还记得在半倦阁酒家父子便宴，父亲在兴奋之余忆及在大革命时期的往事：他一九二五年于宁乡甲师入党，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驱逐学阀李翰庵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后从广州政治讲习班毕业回湘，分配宁乡任特派员领导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组织工农自卫军抗击许克祥。我曾耳闻目睹父亲的革命事迹，因而能敏锐地察觉他在追恋昔日的年华，便问：“您老对过去仍然很感兴趣？！”父亲坦率便相告：“现在有人来找我出山。”我怀着惊奇而祈望的心情问他：“您答应了吗？”慎重的父亲却说：“我得考虑！”我以为大革命失败后，父亲竟作“惊弓之鸟”了。当年反动派悬偿捉拿他，祖父为应付清乡差役。不顾倾家荡产，家遭浩劫，产业破落，年幼无知的我随着母亲东藏西躲，死里逃生，父亲出走江浙，人尚幸存，往事记忆犹新。而今，我竟作苟且偷安之想，不由羞愧地说：“今天可不同民国十六年了。”这次父子谈心，